·志与业·

北京图书馆国际书刊资料交换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杨仁娟

值此建馆七十五周年之际，我作为一个进馆十多年来一直从事交换工作的年青馆员，将平时收集和积累的一些资料写出来，籍以回顾交换组在我馆各级领导的关怀和全组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从无到有，发展变化的简单历程及其成果，以示纪念。

我馆国际交换工作发展回顾

我馆的出版物交换工作开始于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后，至今已快三十八个年头了。是代表我国对外开展书刊交换，从事文化交流最早的机构之一。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1966年）为发展阶段。最初是与苏联一个国家的三个图书馆进行少量的图书交换，仅由秘书科设一专人负责代办此项业务。1951年底，由于业务工作发展的需要，同时学习了苏联列宁图书馆的经验，在采访部下正式建立了交换组。自1953年起交换工作发展变化较大，根据对外文委指示，把东欧一些国家的图书交换列入了文化协定；同时，逐步扩大与少数西方国家图书馆建立交换关系，仅1953年一年收到书刊总量几乎等于前几年的总和。其中90%左右来自苏联，对于交换来的大量复本新书，交换组还负责及时将它们调拨给国内各大图书馆。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特别是自我国加入了联合国组织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了解中国。这时，交换组不仅积极扩大了与第三世界各国的交换，还加强了与美国、日本及西欧一些科学技术比较发达国家的图书馆和学术研究机构的联系。这一时期交换工作发展变化极大，由于我们的人、财、物（书）较为齐备，交换来的书刊数量均居全国之首，北京图书馆天然地成为全国交换中心。到1966年“文革”前，与我馆建立交换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27个，交换单位3389个，赠送单位34个，1964达到了最高记录，换回各国期刊5463种，超过了当时英国、法国、苏联和日本等国国家图书馆的交换工作。

第二阶段（1966—1976）是维持阶段。文革期间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书刊出版品种锐减，科学技术出版物几乎没有，国外交换单位及来书刊量自然随之减少了很多。但交换组的同志们并没有因此停顿工作，而是千方百计维持了当时的交换状态，并努力换回不少因削减购买而几乎中断的国外书刊。

第三阶段（1976—1986）是调整整顿，稳步发展阶段。粉碎“四人帮”后，不少期刊陆续复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的出版物品种日趋繁荣。交换组根据多年来双方来往情况对几百个交换户分别发了征询函，进行了几次大的调整整顿，恢复了一些交换单位，停止、取消了那些长期不来书刊的单位，同时也根据实际需要发展了一些新单位，截止1986年底，与我方建立交换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112个，交换单位1627个，赠送户21个，主动赠我户一百多个，同时还与十几个国际组织有交换关系如：联合国图书馆、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图书馆、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图书馆、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我馆与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大型图书馆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英国图书馆、法国、苏联等国的国家馆，东德国立图书馆交流部、

朝鲜金日成大学图书馆、罗马尼亚中央图书馆，以文化协定的方式达成了稳定的交换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曾派大型图书馆代表团来访并洽谈政府出版物的正规交换。此外，我们重视与国外一些研究汉学成风的大学及其研究机构的交换工作，并一直视为交换重点。

1976—1986年的十年间共换回图书59868种，65605册，资料一万余种，期刊平均每年3000种左右，还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及新西兰等国的政府出版物。

我馆交换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收效

我作交换工作的十多年中，深深地感到交换工作政策性很强，须有明确的方针指导。我馆交换组建立初期，根据国际交换协议精神虽曾明确规定了交换方针与任务，但此间，由于政治形势关系，交换工作主要停留在以宣传为主的基础上。三中全会后，我馆采访会议决定进一步重申和明确了交换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并根据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精神，逐步从以宣传为主转为“通过国际交换，换取我国四化需要的国外资料”，并明确了重点，“同时代为执行我国政府与各国政府签订的文化协定中有关条款的规定，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根据上述方针任务要求，我们的交换原则基本要求为书刊对等或等价，对于那些凡能尽量满足我方要求，表现特别友好的重点单位，我方也尽量满足其要求，提供相应有价值的书刊资料。交换主要是以报刊、各种文版的图书为主，也有地图等其它特种的资料。

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交换工作确有其特性。通过交换途径，不仅补充和丰富了我馆的馆藏建设，还为国家节约了外汇。据初步统计50—60年代交换来的外文书刊约占我馆外文入藏量的40%左右，其中除了不少外国文学名著外，还有不少国外翻译我国古典名作及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这些书籍对于研究中外文化很有价值。在交换中我们还注重收集了不少工具书，如：日、美、俄文版的大百科全书和专业用《医学百科全书》、《工业百科全书》、《历史百科全书》等。近年来，从荷兰换回了最新版本的《国际期刊目录》及许多国家的语言辞典。目前交换组每年收到期刊约三千多种，收书五千多种，可节约相当大一笔外汇额。此外，还有不少政府出版物和一些非卖品，这些则只有通过交换途径获得，如：《数字评论》、《高分子》、《生物工艺学》、《计算机物理》等，这些价值较高的刊物深受国内各学科研究人员的欢迎。

三十多年来，交换组本着补充馆藏及为科研服务的宗旨，有计划地为丰富我馆马列主义收藏和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的研究工作需要收集和补充了不少马恩列斯著作缺卷和毛泽东著作译本；为本馆善本、线装组收集了大量流失海外的珍贵古籍文献的复制品，敦煌写经胶卷，《永乐大典》缺卷和地方志缺卷等。为配合我国科研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除系统地收集国外早期的一些知名科学家，如：达尔文、牛顿、爱因斯坦等人的著作外，还应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科研教学及本馆阅览部、自动化发展部的委托，向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苏联、西德等几十个国家代征了不少资料及一些专业学会刊物、研究报告和国际性科学讨论会的会议录等。

由于多年来交换关系的发展，促进了图书馆界的人员交流，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均曾派人前来我馆工作学习，我馆也先后派出多人前往该两馆工作、进修，进一步促进了交换工作的开展。

改进交换工作中的设想

一、开拓途径，有针对性地开展交换

目前，由于世界各国书刊价格连年上涨，书刊交换日益减少，我们应经常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真正做到知已知彼，有针对性地开拓交换途径，及时换回真正有价值的书刊资料。

二、交换工作人员在职培训问题

按目前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素质状况还很不适应作为一个国家图书馆交换中心的要求。必须认真学习国际时事、对外政策，努力掌握国内外交换工作的情况，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开阔知识面，以适应发展了的形势需要。

三、努力补充我国残缺的古籍珍藏

由于历史原因，目前世界上许多图书馆都藏有我国珍贵的古籍珍本，似有必要设法换回一些流失海外的重要文献资料。

四、图书馆之间的业务协调

在目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我认为图书馆各单位若能达成某种合作，搞类似经济部门横向联合的作法，完善信息网络，很有必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图书馆的国际交换工作显得越来越为重要和不可缺少，十多年的交换工作实践使我感到它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思想和业务素养，以适应今后交换工作发展的需要。

“学术论评”专栏编者的话

本刊“学术论评”栏提出开展关于“转变图书馆学研究方向”问题的讨论已近三年。三年中发表了不少颇有“见道之言”的文章，如：必须转变原有图书馆学中的内向思维—从原有的工作内容和过程出发的经验式的描述—的研究方向而面向社会，面向应用的思想；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在突破经验框架与理性思辨之间要形成一个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点——开发研究的思想等等，已普遍为图书馆界所接受，并引起人们理论思考的兴趣和审视意识。

鉴于以上几个要点已基本得到认同，像其它学科一样，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则是理论研究工作者的经常的长期的艰巨任务。为此，让我们重申“科学的本质特征不是它要探讨什么，而是它要从探讨中得到什么”的名言以结束我们前三年的讨论，并对全国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发表的从新“从我做起”的宣告表示赞赏。让我们从自我做起开发新的理论课题，作出新的贡献。

刘季平家属致谢

刘季平同志病逝后，文化部，北京图书馆治丧办收到各省、市、地区文化厅、图书馆、图书馆学会，以及全国古籍善本总目编委、全国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委员等单位和领导同志的唁电、唁函多件，悼念刘季平同志逝世并慰问家属；还有在京多位领导同志及图书馆、学会各位同志亲临告别并慰问家属，使我们全家得到极大宽慰。我们将继承革命传统，不负季平同志遗愿，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奋力进取，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们对各地来电、来函，不及一一答谢，特借《图书馆学通讯》一角，谨致衷心的感谢。

吴　瀚率子女敬上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一日